

京官名宦与惠州

11

惠州文人墨客 靠丹青雄文 开启民智

作者 / 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

出外学成归乡,创办学校,用教育开启民智,提高民众素质,振兴民族精神,是晚清大变局中惠州知识分子的普遍追求。大概是这个缘故,自晚清至民国初年,惠州涌现的名人,教育界人士占很大比重。

以张友仁、李丹麟、李桂馨为首的晚清惠州文人,大都在科举制度下饱读诗书,具有很高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。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前途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,满怀汲收西方文化、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热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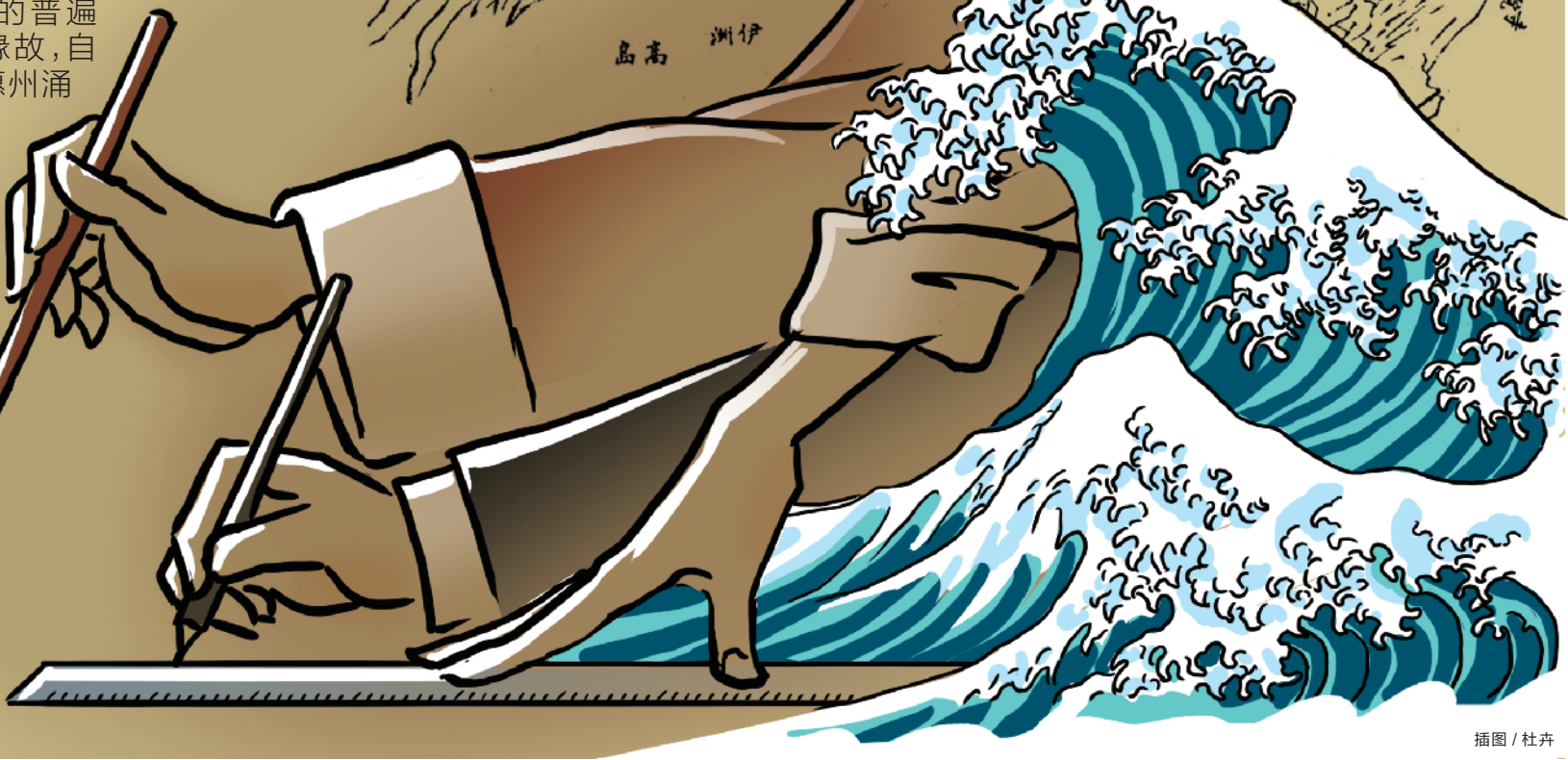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/ 杜卉

丹青圣手借绘画宣介西方文化

国门打开,不少惠州士子获得出国游学的机会。光绪十七年(1891年),当欧渠甲、邓仲果走进康有为万木草堂接受变法思想熏陶的时候,另一位惠州人李丹麟则远赴重洋,去亲身领略万里之外的欧风美雨。

李丹麟,字仁毅,号星阁,归善县城(今惠城区桥东)人。他十岁丧父,靠奋发自学,年方十五即能为街坊作画写对,以诗画名于岭东。他的画法随意挥洒,花鸟人物,栩栩如生,大幅尤见苍劲。他有一幅《百鸟图》长卷,礼部尚书、南海人戴鸿慈见之赞曰:“飞腾隐伏,各有神致,神乎技矣。”

李丹麟也得到惠州知府杨霁的敬重。当杨霁的弟弟杨儒

奉朝廷之命出使美洲时,杨霁便举荐李丹麟,使李丹麟在读万卷书后,获得跟随国使出洋作万里游的好机会。

在这次出使中,李丹麟游历了美、日和秘鲁等国;后来又自费游览越南、柬埔寨及南洋诸岛,时历三年。“行踪所至,举凡山川人物,辄为图说以记之”,得《华盛顿图》《日本富士山图》《南美穷人背子卖物图》等共205幅,集成一书,名《游历图记》。

李丹麟的作品还参加过比利时国际画展,获双龙拱珠金奖。此奖牌挂于汝湖霞村李姓祖堂,1959年被洪水冲走。相传在美洲,他所画的鹰,人以千金争购;其嫁女,画鹰一幅作嫁妆,羡满四邻。这些故事至今在

其才,不予追究。

李桂馨为增广闻见,曾寄居广州伍家园,尽览园中所藏名画。后来游历香江,转赴上海,应聘于一间书局,其间与高剑父、高奇峰等名家共创艺苑,致力于绘画艺术的创新和传播。

不久,他从人出使秘鲁,游历美洲。他和李丹麟一样,笃信“读书行路”古训,并不遗余力地实践。因此其学养日深,“游踪已广,画益超绝,卓然为吾郡名家”。

番禺人黄佐曾以长诗题李桂馨山水画册,云:“壮游东极

惠州坊间流传。

清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,李丹麟任福建永定知县,其时已年过60岁,不久退休返乡。生平蓄有古琴十二,因以“十二琴”名其楼。楼侧建亭,自题为“清秀之亭”,平日读书作诗写画鼓琴于其间。

他热心振复乡邦文化,尝居百花洲,参与管理西湖。又与李绮青同组惠阳宏汉学会,编辑出版《循报月刊》,鼓吹学术,扇扬风雅,奖掖后进。张友仁、叶士材、黄植植等青年才俊,均于此中崭露头角而后成长为民国惠州文坛的中坚。

李丹麟还将画艺悉心传给侄子李长天,培养了又一位著名的惠州画家。

三神山,探险西穷南北美。宇宙奇观眼底收,下笔纵横故乃尔。”民国元年(1912年),其画作《西湖八景图》在巴拿马赛会上获奖,画名大著,为惠州争得了荣誉。

民国三年(1914年)春,李桂馨归乡养病,应世交叶士材之邀,到广东省立三中(今惠阳高级中学前身)教画。受其影响,三中出了一批书画爱好者,其中以秦汉昭(寿宁)、李覃量(若晦)最有名。重视美育、热爱书画,成了民国时期省立三中的优良传统。

史学家张友仁文教基建两开花

有的青年才俊奔赴大洋彼岸饱览异域风情,有的则留在故土,一边教书育人,一边接受来自西方的先进思想、谋求革命。曾加入中国同盟会,先后参加惠州淡水起义、北伐、抗日战争等的张友仁便是如此。他历经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、新民主主义革命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三个历史时期,走过了一条历经艰险而百折不挠的人生之路,既是一位知名学者、开明士绅,又是一位民主主义战士、真诚的爱国者。

张友仁,惠州城区人,清末秀才。废科举后立志献身文化教育事业,投考两广简易师范馆,毕业先后任中小学教员、校长等职。他学识渊博,尤精文史,是继江逢辰、李绮青之后惠州文坛的领军人物。尤其重视乡邦文化建设,倡导成立了惠州私立丰湖图书馆;先后编著了《丰湖文献录》《惠州西湖志》《博罗县志》和《惠阳县志》等,为惠州保存和整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。

张友仁好奖掖后进,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,一批新秀在惠州文坛崭露头角,秦骂生、张凤子、任少游、曾国民以及稍后的吴仕端、古伯伟等,成为后来惠州文化教育界的精英。

崇尚文化教育的同时,张友仁也重视经济实业开发,尤其对发展公路交通和西湖旅游情有独钟,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。广东的很多公路,都是他任广东省公路处处长时规划的。广东首条公路——惠平公路(惠州至平山)就是由他主持兴建的。他还先后筹划和参与了惠樟公路(惠州至樟木头)、福泉公路(福州至泉州)和广汕公路(广州至潮汕)的建设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张友仁历任东江人民图书馆馆长、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、广东省第二届人大代表、致公党中央委员、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那时的知识分子如此多,也和那个时代的特点有关。正如李鸿章所言,当时面临的是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思想等各领域都经历着大动荡、大变化。而被裹挟其中的知识分子,也随着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自我调适,表现出来的主张也是不断变化的。

在大变局中,心怀天下的传统知识分子之所以积极投身其中,也和时代有关。在大变局到来之前,中国思想界已经陷入困境。晚清时代,宋明理学已走到末路,死板僵化的八股文,骇人听闻的文字狱,知识分子被逼进了训诂考据的狭窄角落。这时,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,一批正陷于迷茫中的知识分子,立即放弃了陈腐学术,涌向来自西方的新知识、新文化、新思想,并借之寻求救国之道。

梁启超就是这群知识分子中的一员。他们面对种种学说,如饥似渴地吸收,畅快淋漓地表达。而对各种学说,他们也有接触和认知过程,并随着局势变化,他们的主张也在变化。因此那一批知识分子的主张,吐故纳新的特征十分明显。

但“变”与“不变”始终同在。正如梁启超所说,他变的是思想认知,爱国、救国的理想与追求始终没变。也正是因为内心追求没变,其外化的思想和主张要因应时代变化而不断改变。

近代仁人志士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境界,对后人来说,是留存至今、永不过时的精神财富。

张友仁故居“梅花馆” 或将改造开放

既是清末文人故居,又是“东团”(抗战时期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)活动旧址,坐落在惠州城区金带街上的梅花馆,见证了晚清士人张友仁投身地方建设、济世救国的身影。

近日,记者走访发现,沉寂多时的梅花馆或将改造成文旅新景点。专家建议,可配合金带街文化氛围,在梅花馆内建“双主题”艺术工作室,让曾是惠州一景的梅花馆重新焕发生机。

实地走访:故居“梅花馆”前已无梅花

金带街五巷很狭窄,撑伞难以通过。拐进右手边小巷,一栋两层高的小楼就映入眼帘,这便是张友仁的故居梅花馆。小楼前立有金字石碑,屋内天井宽阔,一排红砖楼梯长满青苔、杂草,直直通向二楼。二楼木门斑驳,踏上走廊条形木板时,脚下咚咚作响。

“前几年我老伴走了,平时就只有我一人住,女儿偶尔过来。”70多岁的住户杨婆婆介绍,张友仁的弟弟是她姑丈,自己嫁到张家后就一直住在这。“文革”时期,梅花馆里部分房屋产权上交房管局,成为公房,目前可居住部分为私人所有。梅花馆现任屋主是张友仁侄子,多年前搬到甘肃定居,与杨婆婆接触较少。

“听老人说,以前的梅花馆门前种了两株大梅树,还有两个金鱼池。”但她嫁过来时梅树已不见踪迹,剩下两个

没有金鱼的金鱼池。听丈夫说,张友仁多在广州居住,住在梅花馆的主要是他弟弟。

“以前的梅花馆看起来很高档,住在这里感觉很骄傲。”杨婆婆的女儿陈女士回忆,梅花馆始建于清朝,是少见的二层青砖建筑,和周边一层建筑相比很抢眼。以前一楼的井水清澈见底、冬暖夏凉,“现在不行了,一楼水井被封,二楼屋顶掉瓦,几乎成了危房。”

张友仁曾是致公党中央委员。近日惠州市致公党市委一行到金带街调研,了解梅花馆相关保护修缮情况后,拟筹集部分经费用于该馆修缮。杨婆婆表示,平日里常有政府人员到访,或有修缮、改造及开放计划。如果未来梅花馆变成景点,她愿意配合,政府为她提供个安身之所就行。

历史回眸:抗战时曾是“东团”办公地

金带街名人故居不少,街坊邻居都知道梅花馆是张友仁故居。但很少人知道,这里也是“东团”活动旧址。有文史专家表示:“把自己家借给别人办公、住宿这种‘麻烦事’,也只有张友仁做得出来。”

“抗日战争时期,日军的战机都飞过来了,张友仁还惦记着随身携带的《惠州西湖志》书稿。偶有遗失,便想尽一切办法补齐。这种乡土情怀实在少见。”惠州学院政法学院历史系主任、副教授包国滔介绍,张友仁先后编著了《惠州西湖志》《丰湖文献录》《博罗县志》等地方文献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他历经17年时间编撰的《惠州西湖志》才终于得以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。有识之士盛赞:“惠州西湖无完书,有之自友仁先生始。”

据《惠州西湖新志》统计,晚清至民国,西湖共有建设项目55宗,张友仁直接参与建设资助的项目就有7项。20世纪30年代,张友仁等地方名士在中山公园筹建“惠州私立丰湖图书馆”,将丰湖书院部分书籍迁入新址,拯救了无数珍贵文献。新中国成立后,张友仁成为丰湖图书馆首任馆长。在任职期间,他每月都抽出部分工资,为图书馆购置书籍、桌椅。

专家建议:建成“双主题”艺术工作室

“改造名人故居成景点,需要的时间不短。”包国滔表示,改造过程中,政府要协调关系、处理资金问题,化解梅花馆屋主、住户的担忧。张友仁后辈要主动向有关部门反映梅花馆的产权、损坏情况,和有关部门达成一致,更快地推进梅花馆的“活化”进程。

面对梅花馆内私房、公房并存的情况,包国滔提供了三个解决方案:一是只改造二楼公房,在户外修建一座观感上切合梅花馆气质的楼梯,让游客在不打扰一楼住户的情况下,直接游览二楼景观;二是以长期租借的方式协调屋主、安置住户,改造整个梅花馆;三是在梅花馆改造后,请回原住户,每月发补贴予以补偿。

“‘东团’烈士后人今何在?这也是很多人关注的主题。”包国滔建议,组织寻找

“东团”烈士后人活动,以访谈录的形式,重现老一辈人的“东团”记忆,把寻找先烈后人、后人寻祖的故事讲给游客听。“让梅花馆做乡土情怀和革命情怀的展示馆,丰富梅花馆的旅游资源。”

此外,包国滔还表示,金带街聚集着不少文人故居和古玩店,未来梅花馆可以因地制宜,靠展示张友仁及族人、“东团”成员及后人创作、收藏的文献、书法、画作,来“实现金带街文化氛围的一体化”。

同时,梅花馆还可以参照佛山南风古灶旅游区的活化模式,吸引艺术工作室入驻。工作室既能产出主题感强的文创产品,吸引游客消费;又能让游客在游览观光之余,自己上手练书法、描摹画作,增加参与感,实现艺术的再创造。



二楼木门斑驳

文史杂谈

梁启超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:近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探索

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夏杨

谈及梁启超,人们首先会提到他酣畅淋漓的文章,“一支笔强于十万雄兵”,对开启近代民智起了重要作用。同时也会感触于他一生思想的多变、善变。

梁启超从旧学起步,师从康有为成其维新运动的得力助手,维新失败后流亡海外;接触革命党后,其主张在立宪与共和间摇摆,最终与维新越走越远;他一生宣扬西方文明,晚年却又力主光大传统文化……

回望晚清民国那个时代,不独梁启超,很多知识分子思想和主张都在不断变化。比如徐特立,幼年在私塾读八股文,后受维新运动影响,成了康梁信徒;戊戌变法失败后,他倾向于孙中山的革命之路;但此后的军阀混战,又令他内心苦

闷;最终选定马克思列宁主义,成了红色革命的教育家。

再如在历史上曾留下污点、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杨度,其思想变化也很波折。杨度是举人出身,开始赞成君主立宪,反对共和革命。袁世凯当政后他倡设“筹安会”,失败后面对万众唾骂痛心悔悟,反对张勋复辟,转向帮助孙中山再创民国。后来他认识到工农革命将是中国未来,在白色恐怖中依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对于这样的前后变化,这些知识分子自身也并非不知。梁启超晚年投身教育,成了清华国学院“四大导师”之一。有学生当面问他:您过去保皇立宪,后又拥护共和;曾是康有为信徒和助手,后来又分手;前头拥袁(袁世凯),后来反

袁;曾和孙中山合作,又分道扬镳、互相论战。“如此前后矛盾,梁先生如何解释?”

梁启超没有回避,他沉吟了一会,认真地回答道:“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,我也批评自己。我自己常说,‘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’。”

但梁启超也并非一味求变,更非为变而变。“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。”他回答学生说,“我一生的政治活动,其出发点与归宿点,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,没有什么个人打算。”

梁启超的多变,是那个时代的动荡变化在他身上的投射反映。他随时代变化及认知变化,不断放弃陈腐观念,勇于自我革新,这是一种开放的态度,显示出这代知识分子心底的坦荡无私。

那时的知识分子如此多,也和那个时代的特点有关。正如李鸿章所言,当时面临的是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思想等各领域都经历着大动荡、大变化。而被裹挟其中的知识分子,也随着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自我调适,表现出来的主张也是不断变化的。

在大变局中,心怀天下的传统知识分子之所以积极投身其中,也和时代有关。在大变局到来之前,中国思想界已经陷入困境。晚清时代,宋明理学已走到末路,死板僵化的八股文,骇人听闻的文字狱,知识分子被逼进了训诂考据的狭窄角落。这时,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,一批正陷于迷茫中的知识分子,立即放弃了陈腐学术,涌向来自西方的新知识、新文化、新思想,并借之寻求救国之道。

梁启超就是这群知识分子中的一员。他们面对种种学说,如饥似渴地吸收,畅快淋漓地表达。而对各种学说,他们也有接触和认知过程,并随着局势变化,他们的主张也在变化。因此那一批知识分子的主张,吐故纳新的特征十分明显。

但“变”与“不变”始终同在。正如梁启超所说,他变的是思想认知,爱国、救国的理想与追求始终没变。也正是因为内心追求没变,其外化的思想和主张要因应时代变化而不断改变。

近代仁人志士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境界,对后人来说,是留存至今、永不过时的精神财富。